

关于毛泽东“大革命”时期 农村调查之历史考察

刘 伟

摘 要: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即重视了解国情,为之后的调查研究作了准备。“大革命”时期,又对湖南、广东、江浙等地农村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调查,写下了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力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及其更早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农村调查实践的起步和萌芽期。

关键词: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大革命”

DOI:10.14130/j.cnki.mzr.2015.01.008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更是他极为重视并始终身体力行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①正因为毛泽东向来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尤其是极为重视农村调查,所以他对中国的社会情形极为了解,才能在“众人皆醉”的社会氛围中,号准中国农村的脉,准确把握革命规律,进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一、准备:建党前后的农村调查

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就注重社会实践,既重视读“有字之书”,又重视读“无字之书”。“五四”之后,他说“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进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因

此,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农村调查。“吾人如果在现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调查,及研究。”因此,“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其人生中的初期调查实践——“游学”,并实现了“三结合”:将调查研究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与游历相结合,与锻炼胆识及培养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相结合。尽管此时毛泽东还未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剖解当时的社会问题,但他已朴素地意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及至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后,一直将调查研究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环节。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大会提出“没收土地”,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②的纲领。然而,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不清楚。建党

作者简介:刘伟,男,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

初期,中共没有把农民运动作为眼前最要紧的任务,就连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也因忙于其他事务而无暇具体实施。

历史的车轮始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作用下运转不停,中共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也随着实践的延展而持续深化。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大会对农民问题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较充分的阐述,并提出了五项农民的特别要求,专门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就推动了进步的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地开展农村调查实践。毛泽东在从事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单独搞工人运动的局限性,于是在中共三大上提出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回忆,这是“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认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指出“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①这些分析是客观的,也是中肯的,已被历史所证明。

农民作为一种影响中国革命的巨大的现实力量,注定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作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以开展革命的广阔天地,必定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虽然这些因素当时并未被多少人所重视,尤其是为国民党政权所忽视,并进而导致其统治根基的瓦解)。历史的发展表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与中国的农民及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大革命”时期的农村调查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州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等职务。这为他继续发扬注重对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作风提供了便利。这一阶段,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对农村进行调查,为他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一) 在湖南韶山等地的农村调查

1924年12月,毛泽东回湖南养病。在家乡的半年时间里,他利用串门聊天、走亲访友等形式,深入贫困农民家庭,对韶山地区农村的政治、经济状

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写下许多有价值的调查笔记。他以通俗的方言和生动的比喻,讲述国内外政治形势,唤起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在其指导下,当地秘密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起农民协会,并成立了20多所农民夜校。期间,毛泽东还成功地领导了家乡农民进行“阻禁平粜”斗争和争夺教育权等斗争,指导了安化、梅城等地的斗争。这些活动,为他深入认识中国国情、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作了必要准备。

毛泽东在组织和领导湘潭韶山一带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收集了许多关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再加上在湘潭西乡同佃农张连初交谈所得的情况,他假定了一户佃农:这户佃农全家3口人,男主人是一个勤勉的佃农,妻子煮饭喂猪,儿子看牛,租种15亩田;全年的粮食和副业收入147元7角2分;全年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之消耗支出167元3角6分;收支相抵,亏19元6角4分。毛泽东对这笔帐进行了分析,认为即使这样的亏折,其收入也要在6个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1)绝无自然灾害;(2)绝无妨碍劳动的疾病;(3)精明会计算;(4)牲畜不病不死;(5)冬季整晴不雨;(6)终年劳无休息。其实,这六条无天灾无人祸的状态,是很少有的。

毛泽东假定的这户佃农,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在经过深入调查并掌握了许多个体的佃农的材料后,作了有根据的科学假定后得出的,数字是可靠的,事例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用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从假定的一户典型佃农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出发,得出了中国佃农状况的一般结论:中国佃农比牛还苦;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打翻封建势力,乃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通过调查,毛泽东还指出农民的重要性: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进而,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农民武装)确实普及于各地民众之中;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作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的权力;随即开始经济斗争,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毛泽东这个别具一格的调查材料,以《中国农村佃农生活举例》为书名于1927年3月出版了单行本(后来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作为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之一被学习使用。

(二) 指导广州“农讲所”学员进行农村调查

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提议,通过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3月16日,委员会决定毛泽东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来自全国20个省,共300多人,是历届农讲所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学员把各自所熟悉的当地农村情况带进农讲所。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农村的极好机会,于是将这些学员作为调查对象,向他们了解各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经常印一些调查表发给学员,要求学员将自己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又每人发12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①。有些学员外出调查归来,毛泽东总要找他们详细询问调查情况,帮助总结提高。稍有空闲,他就来到学员宿舍与其促膝谈心,了解各地农村和学员的思想情况。通过这些调查,毛泽东从学员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能够反映全国农村情况的调查材料。

毛泽东在农讲所除了事必躬亲外,更主要的是引导和训练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去认识农村阶级关系,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1926年,他安排“五十人赴韶州实习一星期,全体赴海丰实习二星期。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②。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农讲所采取各种措施对学员进行农村调查的指导,根据学员所在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为研究会拟出了租率、主佃的关系、利率等36个调查项目。毛泽东对学员调查研究的成果极为重视,亲自修改学员的调查报告,并将一部分调查报告和调查材料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材料。1926年9月1

日,毛泽东在为丛刊写的序言中指出“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③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跃然纸上。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对此,周恩来曾评价“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④美国学者R·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这一段时期所担负的宣传部代理部长、《政治周报》主编、农讲所所长这三项工作中,“只有毛的第三个工作才闪现着未来的光辉”^⑤。这些客观评价的正确性已为历史所证明。

(三) 对江浙等地农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考察

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央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这期间,毛泽东对江浙一些地方的农村进行了考察,最终作出了成文的考察报告。

1926年11月出版的《江阴市志》“大事记”中记载:民国15年(1926年)“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到江阴东乡考察农民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先后考察了江苏和浙江的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慈溪等地农民状况和农民运动情况。当时,浙江慈北闹荒,农民开展了有组织的暴动。据上海《申报》1926年9月17日报道“13日上午8时,发生聚众捣毁警署案……(农民)各持棍棒,奋勇入署,将物件捣毁……印花800余元,钞票数千元尽烧毁在内,其警察亦有多人受绑。”^⑥周水平领导佃户向地主劣绅进行减租的斗争声势浩大,可惜的是惨遭军阀杀害,各地人民愤怒声讨孙传芳残杀农民领袖的罪行。《向导》周报、《中国青年》、《人民周刊》等全国有影响的新闻媒体,都先后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文章^⑦,对事件经过进行详细介绍。这些风起云涌的

①黎永泰《毛泽东与大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②绮园《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中国农民》1926年第9期。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0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⑤[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修订本),刘路新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⑥《申报》,1926年9月17日。

⑦徐泉法《对毛泽东1926年实地调查江浙农民运动的考证》,《足迹》2007年第2期。

农民运动对毛泽东触动很大。通过对江苏、浙江两省的农民运动进行悉心的调查,广泛收集农民状况的材料,毛泽东草拟了《目前农民运动计划》,并撰写了署名“润之”的文章——《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此文于1926年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为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奠定了基础。

此外,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对当时全国土地占用情况作了调查,并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10%的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70%;中农占15%;而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可耕地的10%—15%。这些调查材料清楚地说明了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四) 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出现了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对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右派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叫嚷“糟得很”。对此,中共内部也出现激烈争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人,虽然也认为中国以农业为基础,农民占大多数,不可忽视农民的力量,但是当农民真正起来的时候,却受到反动派的攻击叫嚣的影响,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左倾”、“妨碍统一战线”,并采取种种措施处置和限制农民运动。

面对纷争,毛泽东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农民问题。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回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等5县。在这次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的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广泛接触了各方人士。每到一处,他总是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团体的汇报,邀请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运干部开调查会,还找“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他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农民请教,事先列出提纲并在实际应用中灵活掌握,获得了许多实际材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先刊登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12日,《向导》开始刊载。4月,瞿秋白在为考察报告单行

本所作的序中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①可见,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意义非同寻常。

更重要的是,《向导》发表第一至七部分后仅两个多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便在5月27日出版的俄文版第95期上转载了该考察报告。半个月后,英文版《共产国际》也于6月12日予以刊载,并在扉页上加了一段俄文版上没有的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叙在湖南省旅行的报告了”,赞扬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②。可见,毛泽东对湖南农村进行的社会调查,不仅在党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国内外的影响也非同一般。

随后,毛泽东在由他主办的设在武昌的中央农讲所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学员系统地讲授了《报告》的内容。学员们深受鼓舞,纷纷把《报告》的精神函告家乡。方志敏从武汉回去时,“把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手抄本)带回江西,向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农民运动的领袖、骨干分子,作了详尽的传达,并组织学习”。“赣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③。这些举动把已经开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此次考察,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团讲“关于农村调查”问题时,说“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运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

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

②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③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不妨哩!”^①正是根据调查获得的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才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

实践证明,这个报告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农民运动思想,而且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②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则更没有发言权。正是在充分而正确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毛泽东才深刻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步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思想,较早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的阶级政策。

三、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进行的调查研究,与他学生时代进行的社会调查活动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不仅表现在他此时的调查研究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调查目的明确、调查有一个从确定选题——深入地调研——调查报告的完整过程、多种调查方法的采用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他能够以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能够从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中,概括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调查报告,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著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形成的萌芽阶段。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更是无法抹杀的。正因为有了这个阶段的探索,后续的理论形态才更加完备,对革命的指导意

义才更加有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在毛泽东心目中,“群众”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他对群众曾经用过“民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不同称谓。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群众情结”^④。正如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讲到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⑤值得注意的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研究,始终体现出与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统一。时至今日,这些思想观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高熙.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M].求实出版社,1988.
- [2]李晋玲.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与理论的历史考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 [3]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北京:湖南出版社,1990.
- [8]张吉清.试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3(4).
-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李斌)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④安建设《毛泽东的“群众情结”》,《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